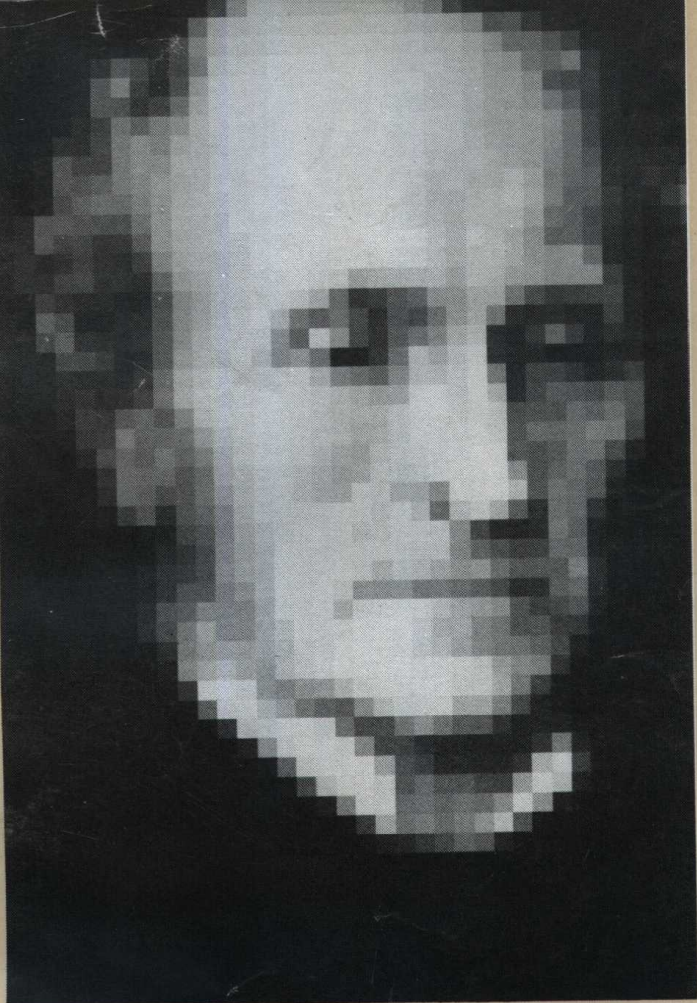


MILL
TRANS. BY LI HE WORLD MASTER THINKERS



穆勒

〔英〕威廉·托马斯 著
李 河 译

穆 勒

[英] 威廉·托马斯 著

李 河 译

(京) 新登字 030 号

责任编辑：舒可文

责任校对：章建刚

封面设计：杨永德

版式设计：李 勇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穆 勒

[英] 威廉·托马斯 著

李 河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艾德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照排

中国建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36×965 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89 千字 印数：1—3500 册

ISBN 7-5004-1359-9/B·295 定价：4.00 元

William Thomas
MIL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本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5 年英文版译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张晓明
副主编：章建刚
编 委：安廷明 孙乃修 刘 继
 李 河 李鹏程 张晓明
 何明虹 章建刚
美 编：张 强 杨承德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

6.21.84/96
编者献辞 03
07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和有关编辑富于勇气的决定，《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从1985年到1992年，《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断断续续出版了36本。在编辑这套文库时，我们出于整体上的考虑收入了其中31种，并全力推出29本新书，形成了目前的规模。文库包含6个函套，每个函套中的10本书大致是依照传记主人公的生活年代编定的，读者在阅读之后或许会对某个思想时代形成一个总体的印象。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读者，此次未被编入文库的5本思想传记，无论就传主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就译文的质量而言，都丝毫不比目前这60本逊色，它们是：《柏克》、《亚

当·斯密》、《赫尔岑》、《托尔斯泰》和《福泽谕吉》。

值此文库出版之际，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1985年7月，我们在着手这项工作时曾设想“在三至五年内出书百本以上”。事实证明这个想法过于浪漫了。主观的愿望和努力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面前总是要脆弱一些，而后者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套丛书的命运：起初，《尼采》和《叔本华》等书在某家电视台的画面被归入“黄书”一类；其后，理论图书市场的滑坡又几乎使这桩事业半途而废。因此，在推出《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的时候，我们几乎无暇为这个国内数十年来第一套大型思想传记丛书的最终出版而感到庆幸，我们更意识到：这套丛书的遭遇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命运，并且它似乎还很难在世纪的转折之前有根本的改善。

经济的繁荣是世纪末的主题，这对于我们这个饱受一穷二白之苦的民族来说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同样现实的是，在素有“启蒙运动”之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七十余年中，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还没有塑造出一个能与我们这个泱泱大国的地位相称的独立学统，这种迟缓的进程在世界各大文明民族的社会转型时期是不

多见的。破坏多于建设，情感多于理性，我们的思想文化总处于一种“无根的”流放状态。且不说这种思想文化的贫困已经并将继续给社会、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怎样不利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普遍缺乏理论教化、思想表现和自我意识，那么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只会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过客，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

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说过：“思想即供奉。”我们献给读者的这套《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文库版）正是用以供奉思想的一个祭坛。与思想家同在，与人类文明的成果同在，这应是我们民族现代化理想的一个重要内涵。

此时此刻，我们尚无从琢磨新世纪对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们仍祈盼着它的到来，因为那毕竟是一个旧世纪的结束！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1993年3月13日

目 录

作者序言.....	1
第一章 教养和教育.....	3
第二章 精神危机及其后果	41
第三章 科学和社会科学	69
第四章 政治经济学.....	102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精神导师.....	122
结论.....	167
译后记.....	173

作者序言

穆勒的著作拥有广泛的读者,并且成为浩如烟海的文献的主题,所以我写的这部小传充其量只是一个解说性的尝试。在关于穆勒的这类著作中,大多数作者是职业哲学家,而本书则是由一个历史学家写成的。由于我的工作从近来许多评论者那里获益匪浅,所以我不敢说这本书谈到了什么前人没有说过的东西。如果说它还有什么独到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格外重视穆勒本人对其所受教育的评论。当他应邀为一本传记辞典撰写他的生平传略时,他说他所受到的全部教育都来自他的父亲。果真如此(至少穆勒在其生命的暮年是这样看的),那么,要想公正地评价这位“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就必须对那种塑造着他的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如果

说这样一来就会使他的独创性在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中相形见绌，那或许只是因为其他思想家很少这样谦逊地坦言自己所受的恩惠。因此，这当然无损于他作为一个人的形象。

这本书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帮助。约翰·罗伯逊、泰伦斯·巴尔和朱莉娅通读了手稿并且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阿兰·赖安关于穆勒的两部著作以及他和我的讨论澄清了我的许多难题。我的许多同事或许并没有意识到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尤其是彼得·鲍尔策、科林·马太、约翰·戴维斯、露西·钮林和伊安·哈里斯。此外，如果没有约翰·罗伯逊及其编辑《约翰·穆勒选集》的同事们的编辑工作，对穆勒的解释，尤其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将很难避免失误，因此，这项工作的价值的确是不可低估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编纂了本书的索引。最后，我由衷地感激基斯·托马斯邀请我撰写这本书并对我的拖延表示了极大的耐心。

威廉·托马斯

牛津

1985年2月

第一章 教养和教育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于1806年生于伦敦。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一个出身微贱的苏格兰人，他象许多有才能的乡下人一样从苏格兰南下靠写作谋生。在从事了一段新闻工作之后，他决定写一本《英属印度史》碰碰运气。这项工作本来预计在3年内完成，但实际上花了11年的时间。这是一段艰苦的岁月，他必须要维持他的妻子和一个不断添丁进口的家庭。

詹姆斯·穆勒对印度史的研究对他的儿子的童年和以后的生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穆勒的家里，一切事情都要由这个养家糊口的人来决定并要服从于他的要求。约翰·穆勒从他父亲那里学习了他的全部课程。他读的是父亲正在读的书，并参与讨论双方提出的问题。在

11 岁时,他帮助父亲校读了《英属印度史》。在该书出版后不久的 1818 年,由于詹姆斯·穆勒所具有的专业学识,他被任命为东印度公司的助理检查官,这项任命使他的家庭经济状况获得了根本的改善。他现在可以从容地研究那些令他感兴趣的哲学和政治问题,可以在乡下买一座住宅,可以为他的长子选定一份自由的职业。他一度考虑让约翰·穆勒从事法律工作,但在 1823 年,由于公司有另外一个助理检查官的空缺,詹姆斯·穆勒便为自己的儿子谋得了这个职位。这样,直到约翰·穆勒在 1858 年辞职之前,他一直在为英属印度政府工作。总之,由于这本支配着其童年时代的著作是一部关于一个落后民族的征服史,约翰·穆勒成年时期的职业便注定要参与对这个民族的管理。这种关系可以解释他对落后和进步社会状态的先入之见,这种见解在他的全部政治问题论述和大部分思考中打下了深深的印迹。

一个最引人瞩目的事实是,约翰·穆勒受教育的过程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经历。这与其说是由于他父亲的贫困,不如说是由于他的孤傲。詹姆斯·穆勒的确不算富有,但也从没到负债的地步。实际上,他有一些象股票经济人大卫·李嘉图和哲学家杰雷米·边沁这样富有的朋

友。约翰出生在伦敦郊区，然而，詹姆斯·穆勒与边沁的交情使他来到了市中心，有一段时期他们在威斯敏斯特的维多利亚广场与这位老哲学家毗邻而居。在1814年到1819年之间，边沁总要在穆勒父子的陪同下去萨默塞特郡的福特大教堂避暑。约翰·穆勒后来对这段充满中世纪情调的经历眷恋不已，它“完全不同于英国中产阶级所过的那种局促抑郁的生活”（《约翰·穆勒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1卷，第57页）。

不过，约翰·穆勒忍受的是另外一种压抑的生活。詹姆斯·穆勒决心亲自教育他的儿子，而对他的童趣漠不关心。他的家里几乎没有儿童的图书或玩具，也没有什么室内游戏。穆勒夫人是一位和蔼可亲但忠厚无用的女人，她对丈夫的严厉态度听之任之并且没有用她对儿子的爱和温情来抵消它。因此，当约翰·穆勒在多年之后回顾这段童年时光时，他实在想不起自己的母亲究竟有哪些事情值得一提，所以干脆对此保持缄默。他能够回忆起来的无非是父亲强加给他的那些艰涩的图书和难以理解的问题。他大约在3岁时就开始学习希腊文，8岁学习拉丁文。在10岁之前，他已经通读了柏拉图的六篇对话。此后，他开始学习他父亲十分感兴趣

的逻辑学。有时他可以阅读一些较为轻松但很少是浅薄无聊的东西。约翰·穆勒博览史书，他很喜欢《鲁滨逊漂流记》，他的父亲还鼓励他阅读甚至写作一些诗歌。但他不可能仅仅为了愉悦而无忧无虑地沉浸在富于想象的作品之中，一切的一切都必须服从于詹姆斯·穆勒所制定的刻板的计划。

这种教育方式是十分苛刻的。父亲和儿子共处一室，在各自的桌子上工作，约翰被撇在一旁与他的问题苦斗，当他打断父亲的工作寻求帮助时，他必须鼓足全部的勇气。在一天结束时，他们通常到外面散步，这时詹姆斯·穆勒会要求他的儿子对读过的东西进行解释并说说他究竟懂得了多少。然后，他必须对这些知识加以实际的运用。在弟弟和妹妹稍大之后，约翰必须为他们讲课。如果他们学得不好，他就会和他们一道受罚。还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当作一个秘书来对待。在他 13 岁时，他开始接触到了以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詹姆斯·穆勒在散步时向他解释这门科学，并要求约翰写出讨论稿由他批阅。其结果是一部介绍性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入门》，该书于 1820 年出版。在他少年时期的后几年中，约翰

参与了他父亲的全部写作活动。当他在 1823 年获得东印度公司的职位时，人们必定把他看成是詹姆斯·穆勒的一个复制品。

如果约翰·穆勒不具有超人的天赋，这样一种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正是这个孩子在自己把握那些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敏捷和潜力才激励他的父亲给他灌输更多的东西。但总的来说，这种方法的严格性的确带来了真正的益处。它从不再琐碎的事情上浪费时间。约翰·穆勒在 20 岁时已经成了他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从不在于那些巨大的和难以解决的问题面前望而却步，而是全力以赴地凭借着自己的才能耐心地 and 系统地求索出它们的含义。他很早就知道，把握一个主题的最佳方式就是写出自己关于它的“系统论述”。他的逻辑训练使他不致成为一个头脑中装满深奥陈旧知识的迂腐学究。“使我的工作获得高效率的首要智力活动就是对一个糟糕的观点加以分解，找到它的论证谬误之所在……这种坚韧的思想操作是由我的父亲培养起来的。”（《选集》，第 1 卷，第 23 页）这种日常的训练包括培养良好的记忆力和流利的论述能力。在很小的时候，他写的一手清晰流畅的散文就超过了他的父亲，而他的作品中最诱人的地方在于能够以明白畅达的方式表

达出那些晦涩抽象的观念。在其生命的暮年，他谈到苏格拉底对话不止有益于论辩技巧的训练，而且是全部科学知识的基础。他认为，正是由于父亲对这种方式的重视，才使他的教育没有沦为一种单纯的“填鸭”式活动。他的父亲孜孜以求的“不止是在教育中按部就班地培养他的理解力，而是如果可能便超越它”（《选集》，第1卷，第35页）。因此，约翰·穆勒所形成的信念不是一些单纯的教条，而是经过精心确立的、可辩护的立场。作为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在所有的方面都得到了武装”。

当然，这种训练也带来了它的问题。在穆勒的少年时代，许多和小穆勒接触过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自高自大的人。人们不知道这个孩子无疑将成为一位世界的改造者。由于坚信他可以揭示出传统信念和习见背后的错误根据，他开始申明自己的观点。最初他的活动仅限于一些小型的讨论团体，后来他出现在一个由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组成的论辩团体的讲坛上。在20岁之前，他就已经为报纸和期刊撰写了大量成熟老练的文章。

他的一些同辈称他为“一个制造出来的人”。他本人曾动情地坦白说：“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童年，从没有玩过板球：我们最好还是让本

性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但是，穆勒的许多读者都怀疑本性是否具有自己的成长方式，他的上述看法或许只是他对这种过于理智化的统治一种感受。而在其《自传》中，穆勒提出了这样一个成熟的判断：他的例子表明，当大多数儿童被放任自流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向他们教授那些十分难懂的科目。这种说法的寓意在于，他早年学到的东西一直对他产生着影响。目前，我们尚无从确定穆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出了他所受到的训练，因为这就要求我们至少能勾勒出这种训练的主要内容。显然，目前这本小书无力承担这样的任务，所以我们只有求助于穆勒自己给出的例证。就《自传》而言，它的大部分内容谈到的是他在 24 岁前所受的影响，在这其中，又有近一半篇幅介绍的是他在 20 岁之前的经历。

在描述他和他的朋友们所接受的信条时，约翰·穆勒小心翼翼地说：它“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由那种与那位作为一个长者和导师的边沁有关的边沁主义所塑造的，毋宁说它是把边沁的观点与现代政治经济学和海特莱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的产物”（《选集》，第 1 卷，第 23 页）。现在，让我们对这些内容依次进行考察，审视一下边沁的伦理学和法律思想、李嘉图的